

1894-1911

『从政治体制等视角审视晚清到民国的变迁』

火堆上的

刘大木◎著

晚清帝国

清廷皇室、北洋派、地方实力派，派中有派，士绅、买办、维新党、革命党，党内有党，
挽救帝国的改革为何成了社会各阶层的殊死搏斗？



火堆上的 晚清帝国

1894-1911

刘大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 刘大木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14-17603-5

I. ①火…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清后期
IV. ①K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8626号

书 名 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著 者 刘大木
责任编辑 石路
装帧设计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65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7603-5
定 价 48.00元



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中国历代王朝难以逃脱的宿命，清王朝自莫能外。然而清王朝又有不同于往朝的特殊情境：在它步入衰落之际遭遇到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这个亘古未有之奇变，本来可以成为清王朝振衰制乱的转机；但它的保守、颠预和患得患失，最终还是断送了清王朝的政治生命。当王朝的自我改革表现得缺少诚意和成效时，不期然而至的便是防不胜防而新旧结合的体制外摧毁行动。刘大木的大作《火堆上的晚清帝国》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个荡气回肠的大故事。晚清新政史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已很丰硕，但刘著以文学之笔述史家之事，去概念化，去脸谱化，去肢解化，娓娓道来，栩栩如生，特别适合新时代读者群阅读；而且作者立意高远，在求历史真实中更求历史真解，激发读者诸君一同深思，尤其难得。

——何卓恩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代表作有《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新遗产》）

史观不错，文笔也不错，然而读得不轻松，大概是不能忘情于旷日持久却难产新婴的乱世。没有审美距离，甚至没有时空距离，虽然火堆早已远去。

——王乾坤教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代表作有《鲁迅的生命哲学》）

《火堆上的晚清帝国》是一本结合了学术思考与优美文笔的上佳历史通俗读物。该著讲述的是一段相当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众多，事件繁杂，全书史料可靠，叙事结构精巧，文笔通俗优美，堪称佳作。这是一段值得国人时时回顾的历史，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魏风华（著名历史作家，代表作有《唐朝的黑夜》《绝版魏晋》《抗日战争的细节》）



推荐序



推荐序
从「老屋拆迁」到「共和月饼」

从“老屋拆迁”到“共和月饼”

认识刘大木先生是在天津的一个民间读书会上。那天，研究儒学的老朋友金纲兄告诉我，刘大木是年轻一辈中少见的读书种子，做学问有拼命三郎的架势。之后经过几次接触，觉得这个年轻人温文尔雅，言谈间有着浓厚的书卷气，读书甚博，主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我更为结识这样好学的年轻人而高兴。后来得知，其实他的史学研究并无师承，基本靠自学，于是更加钦佩他的努力了。

今年五月底，他说有一本书稿要出版，囑序于我。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厚厚的一本打印稿。读过之后才知，这本书稿作者是下过大功夫的，业余水平绝对弄不出来。作品所表现的中国蹒跚走出帝制、沉重迈向共和的主题十分鲜明，庞杂的史料经作者的梳理，展示得简洁有序而又不乏历史特有的深度，不由得让人产生沉甸甸的感觉。

历史本是由人和事构成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是历史写作的基本功。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显示了功力，用的是以人带事的结构，试图糅合传统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抓住清末“老屋拆迁”和民国初年“共和月饼”一头一尾两大变局，让读者如身临其境地体会“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震撼，可以更为精确地思考和把握中国的历史脉搏，以及未来的走向。

我的专业是财税学与财税史，并未专业做过晚清史研究。不过，我曾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财税改革下过功夫。这次阅读刘大木的书刚好可以拿来与晚清的财税改革作一个对比。虽然国内外对这两场革命进行对比研究的专著并不算

少，但从财税角度进行对比的却不多见。武昌起义的背后是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背后是清廷的财政危机。自甲午战后，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赔款，清廷就不断地向西方列强借款。庚子年后，几乎要靠借款度日，自此几乎丧失了独立的财政主权。辛亥时期的南北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外借款的竞争。

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一旦财政失去独立，国家主权便会受到根本性的威胁。法国的情况也类似。为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长期对国王不满的第三等级利用三级会议发难。双方谈判不成，最终触发了暴力革命。

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坊间的研究专书与论文繁多，通俗性的读物也不少，相关的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只是正经史学家的研究文章大多很枯燥，大众感兴趣的细节，他们又语焉不详，而通俗读物一般都是业余写手弄的，大部分史料不太靠谱。而且这一段历史因为处在变局的漩涡当中，头绪很多，非常复杂，真要全方位地编织史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刘大木是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啃了一块硬骨头。

这本书里呈现的有：可靠史料基础上的鲜活的细节，平正通达而不失新颖的史观，通俗幽默而不失优雅的文笔。诸君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能感觉得到。近年来，历史类纪实性读物盛行，这实在是文化传播的好时机。文化普及需要有好书，而好书必须有好作者，好作者须具备三样东西：一是渊博扎实的学识，二是通俗优雅的好文笔，三是服务于大众读者的精神。英国的威尔斯、美国的房龙、日本的陈舜臣和盐野七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学术著作多为高头讲章，繁琐的考证加上艰涩的文笔，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如今将高深的学问转化成通俗读物，让大众读者能轻松阅读，不失为一项功德。一个国家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实在有赖于那些优质的历史读物。本书可以归于这一类。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开放性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历史一次次被召唤，被激活，面对历史其实就是面对现实。时间虽已过去一百多年，但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价值，仍引人深思。读史，或许是我们了解自己和未来的一个办法。

本书的不少细节是我此前在同类其他书中不曾读到的，颇值得一读。比如书中提到甲午年的广州鼠疫，其中提供的数据为：1894年的鼠疫，广州死亡人数达11万，而同期的香港死亡人数仅2550人。愚昧的制度和观念杀害的人远远超过鼠疫。这一结论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当年李鸿章在一次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双方曾有过如下对话。



记者问道：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回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更多的精彩细节，在此不需透露太多，想知道的，诸君还是直接阅读原著为好。

是为序。

李炜光

2017年7月16日于天津财经大学



自序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本书并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戏说历史的游戏之作，而是带有学术思考的通俗历史读物。本书史料真实，言而有据，万不敢胡编乱讲，望读者诸君监督批评。

说起本书的源起，我想起了两件往事。

2009年11月，父亲北来，我陪他逛故宫。在天安门城楼上，几个身穿龙袍的师傅出租龙袍给游客照相。父亲有点心动，被我以时间太紧为由拉走了。在故宫里游览，一路上遇见好几批穿龙袍的照相师傅，他很想照一张，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出了御花园，吃过午饭，时间尚早，便一起去逛北海公园。过了白塔，在半山腰，赫然有一家龙袍照相馆，父亲毫不犹豫地闪了进去，换上龙袍，坐上龙椅，摆好姿势，照相。照片很快就拿到了——穿上龙袍的父亲看上去一脸疲惫，满脸沧桑，哪里有一点儿皇帝的样子？几天后，送走了父亲，我满心愧疚地反思这件事：在父亲心中，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2011年12月，天津，大理道，一家涮锅店，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吃晚饭。出来的时候，与门口一位帮着开门的保安聊了两句，惊讶地得知，这位老兄姓爱新觉罗，乃是庆亲王载振的孙辈，现住在天津庆王府旁边的小屋里。他那年31岁，没上过大学，在五大道给人当保安，每个月挣3000块左右。100年前，



中国发生的那件大事改变了他的命运，否则，他肯定是一位威名赫赫的贝勒爷，而我很可能连给他开门的资格都没有。

当时，我正在整理晚清民国时期关于天津五大道的史料。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五大道里面闲逛，经过孙家鼐的故居，经过庆王府，经过起士林餐厅，经过利顺德饭店，经过马场道上的天津外院，还曾经误打误撞地走进那传说中闹鬼的大楼。街上很静，目光所及，恍若踏进了历史，大有斜阳草树乌衣巷口群燕乱飞之感。

那件工作结束之后，回到武汉家中，一个深夜，翻阅史料，或许是受了当时纪念辛亥百年热潮的影响，或许是受了先前所讲两件事情的触动，心中猛然有了一个想法：何不把皇帝如何在中国消失的故事写下来？把中国人如何从帝制中国一步一步走向现代中国的过程写出来，兴许会有人感兴趣。于是就开始重新整理和阅读手头的资料：先前就有台湾沈云龙先生主编的一套电子版《近代史料丛刊》，又通过网络弄到了一些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集刊，打印了蒋廷黻、郭廷以、吴湘相、沈云龙、张玉发、张朋园、张灏、刘凤翰、黄宇和、王汎森、费正清诸人的专著专书，还到图书馆去翻阅了从甲午到辛亥时段的《申报》，又购得一些大陆学者的专著，作者有章开沅、茅海建、杨天石、雷颐、桑兵、陈旭麓、戚其章、姜鸣等人。从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开始，然后读《光绪朝东华录》，一路读来一路寻访，到天津的五大道，回想当年袁世凯全家狼狈地逃到利顺德饭店的情景；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想象当年光绪帝从紫禁城匆忙赶往颐和园见老佛爷时的忐忑不安；到广州街头，感受孙中山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胆识与豪情；到武昌首义门，重走当年起义军走过的路，回顾史料记载的1911年10月10日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通过这样反复的阅读与行走，我渐渐地回到了晚清历史的现场，带着这样的现场感，我开始了写作。

二

于我而言，晚清不是历史，而是当下。

于我而言，历史不是一片僵尸的废墟，而是生命存在的绿野。

这并非是要拾检克罗齐的牙慧，而是有切实的感悟与体验。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不外二途：一为求真，二为求解。

求真者，须考订史料之真伪，目标是还原历史之真相，希图无限地接近历



史真实。这一派以实证主义为指导，以兰克学派为代表。这一派对史学学科的近代化居功至伟。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兰克理论已然过时，但史学研究要求史料真实性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与铁律。

求解者，希望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对已发生的一切进行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理论解释。这一思路由奥古斯丁开其端，黑格尔为其大将，后来的马克思、布克哈特、克罗齐、斯宾格勒、柯林伍德、波普尔、布罗代尔、汤因比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布克哈特是站在兰克的对立面的，后来黑格尔也成为他的大敌。马克思作为黑格尔思想的后续，自然也在布氏的攻击之列。布氏将文化史人类学思考引入历史研究，将历史哲学的主体——人的位置突出出来，带有反启蒙的味道。所谓的进步史观，近代化，三六九等之时代划分，在他这里全被拆解得支离破碎。

波普尔在其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里有言：历史是无法被决定的。他把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史学领域，其前提是理性的有限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理性本身有自己的疆界，二是人的认识能力也有局限。这是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言说的一个论题，在19世纪以来理性自我膨胀的时代，这个论题遭到了忽视。现在，波普尔又把人们的目光带回到原点。理性的有限性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知识发展的不确定性使未来变得不可预测。在这里，波氏用逻辑实证的思维方式打碎了借助历史预测未来的虚妄迷梦。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里宣称：历史只是一种言说，历史中的书写均是一种文学表达。这意味着历史已沦为人尽可夫的娼妓。这种被命名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上是一种解构，把历史的边界全部拆掉，使历史沦为无主的荒地，让文学这匹黑马在里面纵横驰骋。不过，从他这里我倒是获取了不少言说历史的勇气。其实，无论是古中国还是古希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写从来都是源于个人，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诸公，而不是官家。

一般人看来，历史与真实可画等号。这种观点在怀特那里是要打板子的。克罗齐也坚决要求把编撰的历史著述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分开。世人的研究与书写，都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言说。年鉴派大将布罗代尔虽雄心勃勃地将历史分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拉开架势，写出皇皇巨著，似乎要将史学的内容一网打尽，但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在史学研究中，理性只能认识部分真相。

陈寅恪有言：需对历史作同情之理解。我所理解的历史与自己（认识主体）

处于同一视域之内，关注的问题、思维之方式等方面均处于同一平台，而后历史与当下方可形成视界融合，方能对话，进而历史如同活水活马大踏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这种历史观最亲切，我也最认同。

三

写这本书，目的有二：一是尽量还原晚清历史现场，展示清帝国衰亡的整个过程，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尽力避免脸谱化、标签化的倾向；二是为清帝国衰亡的原因提供一种解释，供读者诸君评判，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在叙事体例的选择上颇费了一番周折，以政治性大事件作为枢纽，选取在事件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核心人物，采用人物合传的方式来编织故事，在笔法上力图接近司马迁和黄仁宇，这样能让文字展示更复杂、更真实、更精彩的内容。人物合传的写法是《史记》书写的重要特色，而《万历十五年》将日常生活与心理分析等西方史学的特色引入到对明代历史的书写，其结构与思路都很新颖。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的特色引入汉语学界后，对汉语史学书写带来了巨大影响。

除此之外，我的历史书写有两个巨大的参照，一个是中国古典的历史书写，《左传》《战国策》、二十四史，还有通鉴体与纪事本末体等等；另一个就是欧洲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历史书写，在启蒙和革命的驱动下，产生了伏尔泰、爱德华·吉本、休谟、麦考莱、米什莱、泰纳、蒙森、伯里等诸多史学书写的巨匠，他们写出的皇皇巨著，至今让人叹服不止。如果说我有梦想的话，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写出这样层次的作品。现代社会，史学的通俗化对于文化的传播意义深远，美国的房龙、史景迁，日本的吉川英治、盐野七生、陈舜臣，都是在这方面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作家。在中华民国时代，张荫麟、曹聚仁、李长之等人都做过这样的努力。如今的中国，需要有更多靠谱又好玩的作品出来。

之所以要以政治史作为核心，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政治史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能够囊括大部分的历史内容，如果抽掉政治史，整个历史的脉络框架就有坍塌的危险。当然，在政治史内部，将制度的变迁、权力的争斗、政治风气的变化，都融入到对历史人物的描述当中，通过故事自然而然的展开来表达这些思考，更多地把思考评判的权力交还给读者。

从时间与政治形态的更替上看，清朝在前，民国在后，清为皇权专制，民



国为民主共和，前者被命名为保守、愚昧、落后，后者为进步、民主、混乱。后者替代前者，被认为是进步的结果。这是一般史家之共识。

其实，从清朝至民国，权力上从清廷至北洋，形态上从中央集权至地方割据。从统一与混乱之局面看，民国为乱世，与南北朝、春秋战国、五代十国一样，是过渡时期。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个乱世是遭逢 3000 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在其中经历的变化乃至裂变都非常剧烈，且难以言说。但乱世里也有其活力，那时的人物或焦虑、或痛苦、或狂歌、或大哭，都有作为人的丰神，有如魏晋风度，晚清民国人物尽有魏晋风度，文字也有其风骨。

清帝国的衰亡史与中华民国的建国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这段历史丰富性的所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都是推倒清帝国与建构民国的力量。在他们之间，是最为稳固的士绅群体。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在地方上最有实力，这里面包括各地的乡绅、买办商人，还有文化教育界的精英，他们的政治态度在变局当中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当然，皇帝没有了，民国建立了，只是变局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并非结束，也远远没有结束，实际上我们如今仍然处在转型期。仅举一例：沿海各地，自鸦片战争以来，开辟通商口岸，延及沿江地区，这些地区既是列强在中国身上安装的吸血管，也是让国人看到西洋文明的窗口。这里的经济比内地要好很多，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要领导改革开放，也还是从广东开始。这样的经济文化格局自 1840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估计 100 年之内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

四

随着西方人的东来，国人的活动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东亚，而是整个世界。他们要生存，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所动用的知识文化与思想资源，以及一些工具手段都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的范围，他们的眼光与思维自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半边身体毕竟还是生活在传统中国的氛围当中，这就使认识这些人物变得有些复杂。关于如何看待近代人物这个问题，笔者清理出了以下几条粗浅的原则：

第一，去概念化，如同剥笋子，把包在外面的部分剥去，那些部分很可能遮蔽了真相。有的是道德上的僵化单一的概念，有的是学术思想上的概念，有的是党派概念，比如说左派右派中间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种种概念称呼，都属于这一类。如果想看清这人到底是怎样的，这些东西都要剥掉，

才能让他们活脱脱地走出来，显现出个体生命的丰富性，才能真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细细考订第一手历史资料，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有一说一，实话实说。有人问：绝对的真相是可能的吗？笔者只能回答：我尽力而为，一切真相都是相对的，对真相的探求永远在路上。

第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近代中国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民族的安全和尊严；二是近代化（或者叫现代化），包括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看待某个近代人物的历史地位，就要看这个人对这两大问题有没有做出贡献，具体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抵御外敌入侵，这些人均可被称为民族英雄，如林则徐、左宗棠、张自忠等；洋务运动就是搞军事经济近代化，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诸人；人的近代化，有鲁迅、严复、梁启超等；学术思想的近代化，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胡适等。一般的说法是，这些人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引领时代潮流，是民族的精英，都堪称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

当然，那些不去回应这两个问题，反而进行阻碍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只能看作是近代人物里的败类。比如慈禧太后，统治能力堪比古代英明君王，很有手段，但是不懂世界大势，没有历史责任感，为了保住自身地位，不惜对内压制，对外谄媚，堕落至此，民心又怎能不丧失殆尽？她生平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安排好继承人，致使其政治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皇族内部无人可担当大任，一旦乱起，便不能收拾。袁世凯，晚清时本为追赶时代潮流的豪杰，是对中国军事近代化有过大贡献的人，后来沦为政治近代化的绊脚石。汪精卫，本是一时的英雄，有胆气，有才华，有德行，后投靠日本人，成为头号大汉奸。在近代中国，国家民族危难成为时代主题，人无论如何有权位，有名望，一旦在民族大义问题上犯下错误，一定是万劫不复。

第三，尊重个体的创造性。有创造性的人物很少，但影响极大，都是国家民族的精英，都有极大的信心，对中西学术艺术有深入研究，综合中西之长，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比如在政治制度层面有康有为和孙中山，他们的制度设计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学术思想层面有严复、胡适、章太炎，严复把西方的进化论和自由主义带入汉语学界，胡适将现代实验方法与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带入汉语学界，带来了学术思想的范式革命。章太炎将东方文明里的国学整合出来与佛学交相辉映，呼应时代的问题。在科技层面有徐寿、华蘅芳等人。在文学层面有世界级的文豪鲁迅，第一次将平民百姓作为主角写进小说，赋予民众以个体的灵魂。在艺术层面有李叔同等

大师，将西洋艺术的方法带入中国。

第四，身份定位。在其本业内看待他的成就。一个政治家的成就自然应在政治方面去寻求评价的标准，一个艺术家的成就高低也应该在艺术的层面评价。如果仅仅从私德的层面去讲，像高更那样抛弃妻子的天才画家就简直不是人了。在一个瓦匠身上去要求木工的手艺，有如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可笑。

第五，个人的整体性。整体性地看待一个人，不要搞分割。单一弄出一两点来就对一个人物做出论定。袁世凯，晚清时是时代的先锋、潮流的追赶者，民国时成为皇权的复辟者、时代的旧鬼。这两个袁世凯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如果割裂开来，认识一定会有很大的偏差。吴佩孚有过不少爱国言论，因此成为评价很高的好军阀。汪精卫有不少壮举，于是有人开始说他如何好，即使当汉奸也是合理的，实在可笑得很。汪精卫投日如果是对的，那战死在抗战战场上的数百万将士又当如何看待，谁敢说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是没有价值的？近代史上的翻案文章有不少就是在这样一种自以为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思路下搞出来的。

第六，回归历史现场。历史转型时期是个夹缝时代，生活在其中的近代人物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要在历史的夹缝里看待这些人物的私德。在那个夹缝时代，人们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有的人头脑伸进现代里，身子的其他部分还在传统之中。这是近代人物的普遍情况。旧的道德已经崩溃，新的道德尚未建构起来。在道德上，那是一个失范的混乱时代，在那样的时代看待历史人物要相对宽松一点，一根筋地单独用新或者旧的标准去衡量，一定会造成冤案。

至于在私德方面犯下的错误，倘不是恶极之事，而是凡俗之人皆会犯下的，就不必死死盯着不放。把伟大的人物往泥坑里扯，这样做或许可以安慰庸人们卑微的心，让他的卑微显得不那么明显，这实在是没有意思的事，反而更显其人格卑下。只有英雄才能识得英雄，在小人的眼里，这世上是不会有英雄。

五

本书的写作与修改持续了整整5年。在此期间，父亲于2013年12月26日早晨8点突发脑溢血。当天下午2点我赶到医院时，他已深度昏迷。2天后的凌晨2点钟，他离开了人世，令我很是悲伤。记得当年的假期因为要写作而没时间陪他，至今愧悔不已。如今这本书终于出版，算是对先父在天之灵的一种

告慰。

本书能够出版，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著名独立学者金纲先生和天津财经大学的李伟光教授。我能从一个文学青年转变成一个历史研究者，金老师是灯塔一般的引路人。在他的沙龙里，我感受到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风采，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让我终身受益。这次的出版也是他力荐而成。李伟光老师是读书会的老朋友，主要研究财税学，曾提出“死亡税率”的问题，影响甚大，他的学术成就与风骨都是作为晚辈的我不胜钦服的。这次能邀请到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本书写序，我深感荣幸。

特别应该感谢的是石胜利先生。本书从文稿编辑整理到封面设计，石先生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能如此顺利出版，没有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很多。这份感谢的名单上，特别需要提到的人有著名诗人徐江老师、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周建高研究员、独立思想史研究者杜金岭老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何卓恩教授、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伍绍东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赵新兄、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坚兄等。当然，还有不少朋友也应该在这份名单上，只是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出。但愿本书能赢得读者，借此来回报你们的好意。

最后，我应该感谢我的妻子罗莹，没有她的协助，很多事情恐怕无法完成。她对我的信任与支持，让我重燃对学术的信心。

2017年5月26日夜于刮骨堂



目 录

引 子 / 001

第一章 甲午年

一群饿虎找食吃 / 002

邻家有狼初长成 / 004

太后办生日庆典 / 007

李鸿章戴金帽子 / 009

孙中山走“上层路线” / 011

康有为摆架子 / 014

不寻常的甲午年 / 016

第二章 孙中山的成长历程

南国之子 / 019

“破坏狂”孙中山 / 021

父兄使出撒手锏 / 023

传教士的真面目 / 024

当国学遭遇西学 / 026

革命最贵的是人才 / 030

第三章 革命栽了大跟头

广州大鼠疫 / 033

大国手 / 035

革命就是外科手术 / 036

革命债券的“十倍”诱惑 / 037

香港的地头蛇 / 039

想做皇帝的人 / 041

亡命之徒登堂入室 / 042

“货不能来” / 045

第四章 李鸿章日落黄昏

“李二先生是汉奸” / 047

以一人敌一国 / 049

爱国贼的外交梦 / 051

美国的黄昏时分 / 052

李鸿章开新闻发布会 / 053

第五章 孙中山真的红了

两千年和两个失败者 / 055

敬业的私家侦探 / 056

老乡原来是“绑匪” / 058



疯狂的大使 / 059
运一个疯子回国 / 060
康德黎的营救“六步”曲 / 061
媒体制造英雄 / 062
冷板凳上诞生的三民主义 / 065

第六章 改革也需要流血牺牲

慈禧已被权力绑架 / 067
中国最苦命的皇帝 / 069
“调和剂”李莲英 / 073
“绝不作亡国之君” / 074
拔去康有为这颗钉子 / 076
时务学堂里的大跃进 / 077
改革主要是砸饭碗 / 079
刽子手的钝刀子 / 082

第七章 革命与保皇

红叶馆送别 / 084
大同学校的骚动 / 085
不伦不类的大阿哥 / 088
向十一国宣战 / 090
最后的疯狂 / 092
流产的“南方共和国” / 093
一群书呆子的勤王大业 / 094
理发匠告了密 / 098
老哥们很动心 / 100

第八章 慈禧成为改革派领头羊

慈禧很后怕 / 103
全局大洗牌 / 105

“官屠”岑春煊 / 106
瞿鸿禨崛起 / 108
庆亲王公司开业 / 110
端方时来运转 / 112
亲王载沣赴德谢罪 / 113

第九章 袁世凯的新政事业

袁世凯成为大赢家 / 115
把直隶总督晾一边 / 116
袁世凯烧书 / 117
朝鲜是“福地” / 119
一辆豪华列车 / 120
庆亲王—袁世凯同盟 / 121
袁世凯斗洋人 / 122
想进北洋幕府不容易 / 124
天津卫来了警察兵 / 126
一场国际经济诈骗案 / 127
“五路财神”梁士诒 / 129
当官是个技术活 / 130

第十章 袁世凯抓枪杆子

近代陆军之父 / 132
小站新军 / 134
袁世凯编了一首歌 / 136
“忠臣”王士珍 / 138
“干女婿”段祺瑞 / 139
“北洋之狗”冯国璋 / 140
彰德秋操 / 141
新军黑马黎元洪 / 144